

罗大纲学术论著自选集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罗大冈学术论著自选集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永明
封面设计:王征发
责任校对:王京丽

罗大冈学术论著自选集

*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外花园村)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 字数:323 千

1991年4月北京第1版 1991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81014-309-3/1·8

印数:1—3,000册 定价:19.50元



罗大冈先生

出版说明

为弘扬中华文化,传播社会科学名家的优秀学术成果,推动社会主义学术文化研究,我社在推出《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名家自选学术精华丛书》(1988年出版)之后,继续编辑出版著名专家学者《学术论著自选集丛书》。每种均由作者自选、自序、自传。本书即该丛书之中一种。

此项工作难度较大。限于我们的水平,工作中难免疏陋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元月

导 言

研究法国文学是我毕生锲而不舍的专业。从1947年起，我开始发表评论介绍法国文学的论文。当时我执教于天津南开大学。我的论文极大部分发表于《天津大公报》和《益世报》的文学副刊，以及由朱光潜先生主编的《文学杂志》。从1947年到今天，倏忽40年过去了。除去“十年动乱”，差不多整整30年，我不断地撰写关于法国文学的述评文章。读书、写笔记、写读书心得，始终是我的学习方式、研究方式。成捆的笔记、文稿，“文革”期间“造反派”来抄家时全部抄走了。当时我恳求他们给我几天时间，让我把笔记和文稿编一个目录，以便日后查阅，然后请他们把全部材料“抄”走。“造反派”冷笑，说：“今后不会再让你写文章了！”结果被他们抄走的材料全部散失，荡然无存。如今，我已是耄耋老人，精力衰退，来日无多，不能再整天伏案工作。我写文章离不开材料，所以现在我已不可能再写系统的长篇论

述，只能凭一得之见，偶然写点短稿了。

最近承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同志们鼓励与督促，选编了一部法国文学述评文集，收旧稿 25 篇，无非提供一点资料，供后之学者作为参考而已。

这部旧稿选集的总标题本来是《街与提琴》，也是集中第一篇（分上下两部分）漫谈法国现代诗的标题。但由于本稿列入《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名家自选学术精华丛书》出版，为了统一起见，标题由编辑部按照丛书计划决定。

至于我为什么很早就考虑用《街与提琴》这个题名，下文将加以说明，请高明指教。不同的意见可以提出来讨论，因为这是学术问题。

本选集所收 25 篇旧稿极大部分已在报刊上发表过，其中有一两篇是劫后余生，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也没有受抄家之劫，因为夹在旧书堆中，抄家时未被发现，成了漏网之鱼。我想出版社这次出版的丛书中，有不小的一部分材料是劫余残存之稿，所以弥觉可珍。

本选集所收旧稿全部是 1947 年以后写的，只有一篇例外：《诗人萨曼》。这篇幼稚的文稿是 1932 年起稿的。

除《诗人萨曼》外，集中 24 篇文稿的写作时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7 至 1948 年为第一阶段。那时我刚刚从海外归返别离已有 14 年之久的祖国，心中充满愿意祖国读者多知道一点法国

文学实况的热情，所以写了不少篇在法国耳闻目见的文坛现象的短文，在报刊上发表。

第二阶段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到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这一阶段写的文章都是上级下达的任务，配合“反右”运动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批判某些外国文学作品中的错误观点。

第三阶段从1976年“四人帮”垮台以后开始，直到今天，也就是最近七、八年来写的一些短文。

这本选集25篇旧稿分为三辑。不是按发表的时间先后，而是按文章内容编排的。第一辑《街与提琴》包括论文9篇，主要评论法国现代抒情诗，这是我最近几年研究的重点。第二辑《批判继承》，收10篇文章，其中6篇是关于罗曼·罗兰的。目的在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分析和评论几部古代和现代的法国文学名著。第三辑《为人生的艺术》，只收6篇文章，大部分是介绍20世纪法国进步文学的。最后，作为对立面举例，评述了50年代轰动法国资产阶级文坛的“风流”女作家萨岗（生于1936年）。

这部论文集头两篇论文题名《街与提琴》绝对不是故意标奇立异，而是一系列考虑的结果。外国文学评述工作也是思想理论工作。一个人如果的确掌握真理，实事求是，完全可以而且应该

心平气和地说服人，而不必处处都摆出处理敌我矛盾的架势。

记得在《资本论》法文版序文中，马克思写过一句话：“把渴求真理的读者都武装起来。”这句话常常引起我深思。做理论工作的人不是为了教训读者，而是用真理把读者武装起来，成为和自己完全平等的并肩作战的战友。因为最后征服世界的必然是真理，不是强权，不是暴力。改造世界的必然过程，就是使渴求真理的人都用真理武装起来，在科学真理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我的精神老师罗曼·罗兰多次声称他自己是“思想工作者”。一个思想工作者是平等待人的人。他决不想把真理作为自己独占的武器，令人望而生畏。科学真理是不容许任何人独占的。独占真理这种思想，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西方各大国自从文艺复兴以来物质文明有很大的发展。他们掌握了物质生产的客观规律，掌握了物质科学的真理。他们企图独占物质文明的真理征服世界，奴役、压迫和剥削物质文明落后地区的弱小民族，世界上无数物质文明落后的民族成了他们任意宰割的俎上之肉。然而从长远看，他们最后必然要失败，因为他们只掌握一半真理：物质文明的真理。他们不重视、不掌握精神文明的真理。只掌握一半真理也就等于完全没有掌握真理。而最后征服世界，改造世界的胜利者是真理，不是暴力。真理是包括物质文明与精

神文明在内的完整的客观规律。真理是物质与精神协调的组合物。思想是上层建筑，是在物质的基础上产生的。然而反过来领导整个真理机体的是精神，是思想，也就是物质的升华阶段，而不是单纯的，处于基础阶段的原始物质。

我们研究现代西方文学，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现代西方生活中，物质与精神的不协调、不均衡。法国文学在这一点表现得也非常突出。《街与提琴》的标题是以这种思考为根源的。街，象征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繁荣富饶昌盛的现象。提琴微弱的旋律象征偏枯的精神文明。

罗曼·罗兰说“我是思想工作者”，这表明他已经为感觉到现代生活缺乏深刻的思想而不安。罗曼·罗兰又常常引用他的前辈，法国19世纪末叶的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艾恩斯特·勒南(1823-1892)亲口对他说过的一句重要的话：“没有自由，就没有真理。”什么因素在压抑西方人心智的自由？不就是沉重的物质财富吗？不就是片面发展，畸形发展的物质文明吗？人只要不是过分地，贪得无厌地满足他的物欲，就可以获得幸福、获得自由、认识真理。如果物欲的重压不从人的心灵上消除或减轻，人将永远得不到自由，得不到真理。这样下去，人类就不可避免地要互相残杀、互相吞噬，甚至于彻底毁灭、同归于尽。

君不见，在巴黎的繁华大街上，一个落魄的

艺人，正在一个比较僻静的角落，拉着他的提琴，向人求乞。在车水马龙的喧闹大街上，你将不相信你的耳朵，因为你忽然听到小提琴微颤的、凄凉的、银灰色的漫长叹息，悲叹当今西方的“文明”世界。

本选集第一篇论文题为《街与提琴》，初稿起草于1947年，曾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过。本文的标题本为《街头的提琴》。经过反复推敲，终于改为《街与提琴》。《街头的提琴》原意在于把法国现代诗的遭遇比作沦落街头的小提琴演奏艺人，说具体点，是拉提琴的乞丐。一再思考之后，觉得20世纪西方“自由世界”主要矛盾也在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分裂。物质文明充分发展，精神文明十分贫乏，两者之间极不平衡，由此造成社会上种种病态、异化、灾殃、悲剧。现代诗并不受广大公众欢迎，脱离实际，脱离人民。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失调，这种病态在当今人类社会中是相当普遍的。一切混乱与祸患都源于此。《街头的提琴》这个标题不足以反映这个严重问题的实质。而《街与提琴》这个超现实主义风格的标题反而体现更大的概括性。繁华喧嚣的现代化大街象征资本主义世界物质文明的畸形发展。在嘈杂的噪音浪涛中显得萎靡不振的提琴独奏，象征现代精神文明虚弱无力，奄奄一息。

我采用《街与提琴》这超现实主义式的形象错综的标题，绝非偶然。这种形象错综的造型是表现20世纪人类社会混乱不安的生活的极有效的艺术法则。

超现实主义文学艺术在本世纪20年代初期开始在法国流行，影响遍及全世界。不论你赞成不赞成，喜欢不喜欢，超现实主义是20世纪人类精神生活异化的最忠实的艺术发言人。作为文学运动，作为文学社团，超现实主义已不存在，可是它的影响直到目前并未消失。无论你赞成或反对，超现实主义和20世纪人类病态的精神生活一样，是客观存在。

我个人并不赞成超现实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但是对于超现实主义适合于表现时代精神的某些美学观点，某些艺术手法的创新，我认为是一定的价值，应当加以肯定的，比如“形象错综”的艺术手法。对于现代诗，现代派文艺，我采取同样态度。不盲目崇拜，也不一笔抹煞全部否定，而是要有分析有辨别地加以实事求是的认识与理解。

我们中华民族是有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古老民族。自从19世纪中叶，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西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步步深入，侵略我国，使我国沦为半殖民地，成为奄奄待毙的“老大帝国”。全仗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

的优秀儿女，经过几十年抛头颅洒热血的悲壮搏斗，终于推倒三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建立了民族复兴的新中国。当今之时，应当说正是我们文化界大有可为之日。但是事实上也出现了不少消极现象，比如全国出版界产生了许多投机取巧，买空卖空，唯利是图的文化商贩，外国文学领域也不例外。当然，这些都是我国总体建设在发展过程中，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小矛盾。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连“三座大山”都能推倒，这些困难一定可以克服，我们身为文化工作者，对我国文化界前途是充满希望和信心的。

1947年5月，我刚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职不久，有一天晚上，月白风清，几位外文系的同学来邀我到同学宿舍去做一次关于外国文学工作的谈话。我欣然从命，跟了几个年青人奔赴会场。我对同学们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学习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千万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国人！”直到今天，我要和有志于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的青年们说的第一句话，仍然是：“我们搞外国文学，千万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我们搞外国文学，为的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文艺复兴，为的是振兴中华，为的是发展、丰富与更新我们自己的精神文明。

我们研究外国文学，尤其是面对西方现代派的文学，采取五体投地、盲目崇拜的态度和不加分析辨别全盘引进、全盘接受的态度都是错误

的，是过去半殖民地心理的残余势力在作祟。反之，如果采取闭关锁国，视外国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为禁区、为毒草，采取完全否定，一笔抹煞的排外态度，也是错误的。这是几千年来封建保守势力的后遗症。

几千年来，我国人民一直在封建统治下生活，一直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几千年来，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方面，始终是尊古守旧，陈陈相因，反对逾越常规。厚古薄今是时间范畴的保守；闭塞排外，是空间范畴的保守。总之，保守思想几千年来成了我们民族精神的特色。不发展、不开拓、不改革，文化必然趋于僵化，以至枯萎。所以这个古老的文明大国，在19世纪中叶一与西方物质文明先进的侵略势力接触之后，立刻显得虚弱懦怯，无力自卫，一败再败，落到亡国灭族的边缘。这种惨痛的历史教训值得我民族永远记取。

四个现代化不仅是物质文明的革命，也是精神文明的革命。这一点似乎很少为人所重视。因为现代化这个概念意味着不停的发展与变革，意味着不停追赶先进国家，要么超过追赶的对象，要么落后于它们。不可能只要求永远与它们并驾齐驱，不先不后。简括地说，“现代化”意味着“动”，永远的动，而不是静止，不是固定。已经过时的落后的观点，比方我国过去的文化特色，意味着追求固定的一点，固定的标准；把这标准

固定下来，千秋万代永远瞄准着这固定的标志去努力，以不离开这个标准作为最高理想。

旧的世界观，旧的人生观是一个“定”字。新的世界观，新的人生观是一个“动”字。新的世界观从什么时期开始？从黑格尔的辩证认识论开始？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开始？在这个问题上值得做一番专门的科学研究。

现代的新概念是：“动”是绝对的；“定”是相对的。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上，均衡是相对的，不均衡，即差别与矛盾是绝对的，但是均衡与矛盾之间必须形成一种节奏，一种协调。现代人类生活的不安，来源于丧失了这种节奏，这种协调。并不是说，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必须有一种固定不变的，一种“死”的均衡。

现代文学艺术的特色，或者说，文艺的现代性，也表现于“动”是绝对的这个基本概念。现代美学的任务在于强调“动”，也就是强调变革，强调创新，并使之形成一套理论体系。例如现实主义。在我国文艺界，在许多人的头脑中，现实主义是一个固定的美学标准，是一个“死”的概念。一提到文学上，尤其是小说上的现实主义，人们就问：“比巴尔扎克如何？”好象把巴尔扎克看成是一种“死”的、固定的、绝对标准。这种概念都已经陈旧了、过时了，人们发现它们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人们要求新的、更科学的概念，就是用“动”的概念来代替旧概念。超现实主义的

企图何尝不是要找一个新的更科学的现实主义概念来代替古老的现实主义概念。至于它找到了没有，这是另一个问题。仅就它寻求新的，“动”的现实主义概念这一企图本身来说，它具有现代性，是有生命力的。

最后，我认为对于未来的外国文学工作者很重要的一点，有决定性的意义的，就是（我在别处已经谈过不止一次）：必须再认识，充分地认识研究介绍外国文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过去，人们正确地认识到，有了古代文学以及外国文学的借鉴，我国的文艺家可以创作出更文雅的作品，没有这种借鉴，作品不免粗俚得多。这里，我仅仅谈外国文学，不谈古代文学。事实上，借鉴外国文学的重要性，远远不止使本国文艺家由粗俚而变为文雅。

纵观古今中外，世界上的国家、民族，之所以能立足于地球之上，经历你争我夺的人类社会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考验而不败，甚至还在继续发展、繁荣，首先必然有它们在物质文明方面的基础，同时也必然有它们精神文明方面的优良传统。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或民族精神文明方面的优良品质，都反映在这国家或民族的优秀文学遗产中。所以说，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学遗产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是十分珍贵的宝藏。一个国家或民族必须从这个共同宝藏中汲取养料，才能够维持自己的文化永不凋残，而且

不断地发展、更新与繁荣。不过一个国家要想从这个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中汲取对自己有用的营养，必须下一番艰苦严肃的功夫，必须有研究外国文学的专业班子。

文化交流是关系到各国兴衰存亡的大事。试看欧洲各国，它们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无非从文艺复兴开始，到现在只有五六百年历史。为什么它们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比如文学艺术）发展繁荣得这样普遍，这样迅速？除了其他原因之外，有一条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相互间文化交流十分发达、十分频繁。

文学交流是文化交流中主要的环节。所以说文学交流也关系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兴衰存亡，值得认真对待，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

不过，恕我再说一遍，如果你心中没有社会主义祖国、没有振兴中华的真实激情，我劝你不必从事外国文学工作，因为你没有条件成为有益于人民的事业、成为人民所需要的外国文学工作者。这是我的忠告。

1987.12.19 于燕园